

出版史料 2

出

版

史

料

5042

434

CHUBAN SHILIAO

2

## 稿 约

本刊为史料性刊物，专事搜集、刊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内的出版史料，其中尤以五四运动至一九四九年这三十年间的史料为主，适当兼及古代和当代的重要资料。凡属下列稿件，均欢迎投稿：

一、关于出版单位(包括重要社团所设有的编辑部门或出版部门)的回忆和研究，诸如该单位的创设和发展，经营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二、关于出版界重要事项的记述和研究，包括某一方面、某一事件、某一问题的回忆及历史文件资料的汇编、辑录等。

三、关于出版界著名人士的生平和研究，包括自传、年谱、评传、编辑生涯、轶闻轶事、日记、书信、访问记、调查录等。

四、关于重要书刊的编印实录、版本、编目以及图书评介资料的辑录等。

五、对各种出版史料所作的补充、订正、考证和专题研究以及出版掌故、珍闻、随笔等。

六、除征集文字稿件外，还欢迎推荐符合本刊内容需要的照片、图片或原文的复制件等，并请附上简单说明。

七、来稿请寄上海绍兴路5号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稿件署名听便，但请注明真实姓名和地址，以便联系。

出 版 史 料 第二辑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出版

编 辑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  
出 版 学 林 出 版 社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绍兴路5号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厂

书 号 7259·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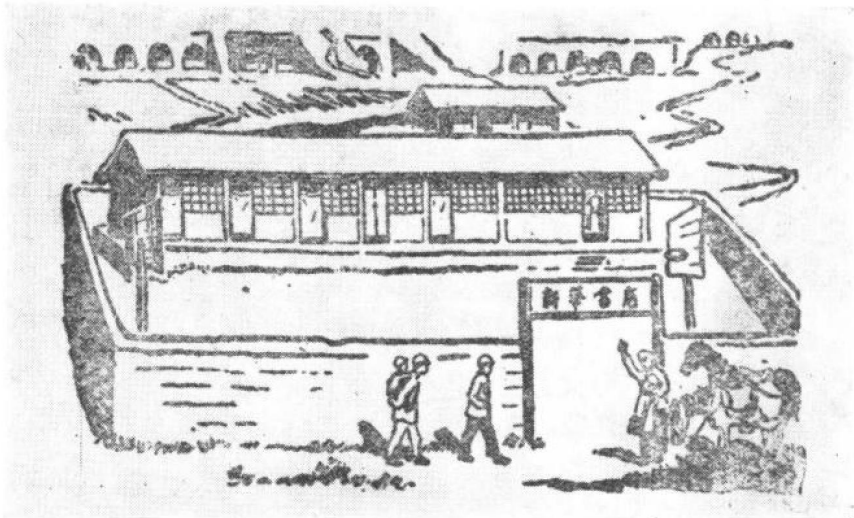
定 价 0.60 元

# 新華書店

一九三九年九月，毛主席为延安新华书店成立亲笔题字。

# 新華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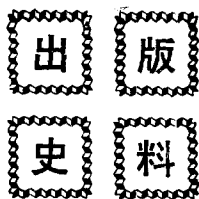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毛主席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再次为新华书店题字。



一九三九年延安新华书店外貌(右上角窑洞为中央出版发行部,左上角窑洞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1. 《共产党宣言》六种中译本
2. 《资本论》六种中译本
3.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印行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



## 第二辑 目录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

新华书店在延安初创时期	周保昌 (1)
回忆延安新华书店	宋玉麟 (5)
太行地区的报刊出版工作	史育才 (8)
从东北书店到东北新华书店	卢鸣谷 (13)
忆华中新华书店	宋原放 (22)

---

马恩列斯著作在我国的传播	吉少甫 (26)
《资本论》广告在中央日报刊出始末	陈汝言 (38)
“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的《社会科学讲座》	丁景唐 (41)
解放前马恩列斯部分著作印行情况	徐觉哉 (46)

---

我和商务印书馆	叶圣陶 (51)
郑振铎书简(选载)	郑振铎 (53)
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	郑尔康 (55)
郑振铎编辑的报刊	陈福康 (58)

---

我的 编辑 生涯	我的编译生活	张仲实 (63)
	在商务的十八年	杨荫深 (65)

---

回忆亚东图书馆(选载)	汪原放 (74)
亚东图书馆保存瞿秋白文稿的经过	郑超麟 (86)

---

人物 志	艾寒松同志在生活书店	艾抗美 (89)
	陈楚云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	张白山 (91)

---

《鲁迅日记》的影印工作	刘哲民 (92)
鲁迅编《现代文艺丛书》的曲折经过	倪墨炎 (97)
书叶小集	姜德明 (101)
《宪政》月刊与宪政座谈会	尚 丁 (104)
《绣像小说》及其编辑人	汪家熔 (108)

回忆	回忆民智书局	王子澄 (113)
忆	在国立劳动大学的岁月	冯和法 (116)
录	海燕十三年(中)	俞鸿模 (122)

纪念生活书店五十年(续)	邵公文 (131)
解放前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象记(二)	朱联保 (146)
感想与希望	魏绍昌 (149)
关于《前哨》的木刻刊头(通讯)	楼适夷 钱小柏 (151)

有关 1919—1949 年出版的革命、进步书刊史料文章编目(一)	俞鸿模 范若由 (152)
-----------------------------------	---------------

扶 闻 · 书 话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旧址(雨札)(37)	在租界里最早印行的《孙中山全集》(王瑞)(21)	鲁迅编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学慧)(40)	谢澹如与瞿秋白(丁言昭)(88)	上海书业公所与上海书业公会(梁泮)(7)	生活书店第一本被查禁的书(廷洛)(73)	《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最早中译本(巧孙)(150)	我国最早的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凡)(50)	我国最早的话剧期刊——《新剧杂志》(凡)(112)	上海最早的画报(基民)(37)	“编辑”一词始见何时?(居吉)(87)	最早出版的出版业务刊物《图书月报》(余录)(121)	粤剧剧本早期出版概况(麦文峰)(145)	商务印书馆拍过电影(阳辑)(157)	我国古代的第一部儿歌集(陆少文)(52)	《木偶奇遇记》和它的中译本(音)(62)
-----------------------	----------------------	--------------------------	----------------------------	------------------	----------------------	----------------------	--------------------------	-----------------------------	---------------------------	-----------------	---------------------	----------------------------	----------------------	--------------------	----------------------	----------------------

编后	(158)
----	-------

封二：一九三九、一九四八年毛主席为新华书店题字，延安新华书店外貌(图片)

封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书影(照片)

封面设计：任 意

栏名篆刻：储招明

题头尾花：陆全根



周保昌

## 新华书店在延安初创时期

新华书店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成立于延安，毛主席为她命名题字，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光荣、战斗历史了。

### (一)

党对书刊出版工作十分重视。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或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环境十分艰苦，但出版报刊和小册子的工作没有停止过，当时物质条件很差，只能刻蜡纸油印。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才有了石印设备，但很简陋，既印书刊、宣传品，又印钞票。为了筹建铅印厂，中央派祝志澄同志去上海采购器材，成立了中央印刷厂，开始出版列宁的《卡尔·马克思》、《国家与革命》和《列宁选集》多卷本等书。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创刊。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新中华报》（四开三日刊）出版。专供党中央了解国内外动态的《今日新闻》电讯稿也相继发行。这些书刊和报纸，都是在延安清凉山的石窑洞排印出版的。

那时的印刷条件很困难。有些字没有字模，就用手刻。书籍封面是木刻的，如一至十六期的《解放》封面，就是廖承志同志亲自设计后搞的木刻；从十七期起才改由毛主席题字。书刊装订成册后，因为没有裁纸刀，只能是毛边。没有电力，就用手摇机器。尽管条件如此困难，出版物却不断增多。

出版工作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加强领导。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中央成立了发行部（后改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机关设在延安城北门外，由当时的中央

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兼任部长，王林同志任副部长。与此同时，着手筹建党的公开发行机构——新华书店，以担负报刊和图书的发行任务。筹建工作是在中央发行部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从事筹建工作的有卜明、王矛、叶文（殷益文）、秦学（孙勤学）和我五个人。

新华书店九月一日正式开业。毛主席亲笔题写了“新华书店”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托他的秘书柴沫同志送来，后由我带到重庆去制作锌版，印在出版的书上。新华书店成立开业的那一天，很多人来店祝贺，我记得张闻天等领导同志也来书店祝贺，使我们很激动、很振奋。

新华书店成立初期，设有批发科、发行科（管期刊订户）、进货科、栈务科、邮购科、门市科。初期暂由王矛同志（对外称王世新）任经理；一个月后，由张道吾同志任经理（解放后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已故）；一九四〇年，由易吉光同志任经理。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发行部出版了七种期刊。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中国妇女》创刊；当时新华书店已在筹建，所以书上印了“新华书店发行”。同年十月，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创刊。一九四〇年二月，《中国文化》创刊，毛主席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这个刊物上首次发表而传播到全世界的。同年二月七日，《中国工人》创刊。当时，八路军总政治部出版了《军政杂志》和毛主席的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有供部队学习用的政治理论读物。中央青委的《中国青年

年》和陕西省委的《西北》也都陆续出版发行。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正式出版。这在解放区里还是第一张对开铅印的党报。此外，解放社出版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列宁选集》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为适应党内在职干部学习的需要，又发行了一套党内读物，如《马恩列斯毛论共产党》、《农村调查》、《党的建设》等等。这些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有计划地编译、出版、发行的。当时的新华书店，就担负着上述党报、党刊、书籍、杂志的发行任务。它面向陕甘宁边区、面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面向国统区的大后方。它的任务很明确，就是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千千万万的群众获得革命理论，从而走向革命。

## (二)

提到新华书店的成立，不得不使人想到在新华书店成立以前，延安就有了一个光华书店。它是在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间成立的。地址在延安城内府前西巷钟楼斜对面，有两间门面，门和橱窗都是玻璃的，算得上当时延安的新式铺子。营业很好，新书一到，就一抢而光。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下旬，敌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城，这个书店不得不搬到西山上去，挖了三个窑洞，作为门市部、文具部和宿舍。在延安学习的青年人心目中，光华书店是他们文化之家，尤其是星期天，买书的人川流不息。当时解放社出版的列宁《卡尔·马克思》，是一本六十四开本，灰色封面，没有经过裁纸刀切过的毛边小册子，是一本最受欢迎的书。再加上西安生活书店不断地寄些书来，营业日益扩大，原有的三个工作人员（张季良、李自强、林之燕）已不能应付，又从陕北公

学调来了四位刚毕业的女学生。她们穿着灰色军装，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整天在门市热情地接待读者。一九三八年七月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交通阻塞，西安方面的书刊运不来了。这样，光华书店就合并到光华商店，成为商店的一部分，地址由原来的西山搬到了南门外山沟里新开辟的新市场去了。

新华书店初创时，把原来光华书店的存书和书架搬了过来，地址在延安北门外鲁迅艺术学院的旧址。山上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住处，山下有七间平房，用来作为门市、批发、期刊发行、进货等部门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不超过十个人。后来因业务开展，又陆续增添了数人。全店（从清凉山搬到北门外开业后）的工作人员，除上述五人外还有：孙毅、张俊、苏予涵、王越、史迈、王文琪、许光庭、魏伯九、黎印、杨志义、乔陆、安仲华、马玉珍、刘思让、何义、杨森、吴彬（范广祯）等人。向叔保同志当时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人，他是中央发行部发行处的负责同志。

在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下，困难是很多的。首先是资金有限，货源也不足。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大后方的革命的、进步的书刊不能经由西安运来。那时，我们从苏联运来了大批马列主义书籍，如《列宁文集》、《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等。这些书是精装本，纸好价廉，在延安的同志，都把它看作是无价之宝；上前方的同志，宁肯少带些被服，也要在书包里多装几本书。当时，纸张非常缺乏，大家遵照毛主席“自己动手”的教导，先在延安附近的茶房，筹建了一个小小的造纸厂，闻名一时的马兰纸，就是用马兰草生产的。这种纸产量有限，质量很差，又无漂白粉，在煤油灯下看它印出的书报很吃力。就是这些用马兰纸印成的报纸、书籍，至今已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教育着革命的后代。

当时交通运输也非常困难。陕甘宁边区自然条件差，没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运书运



报,走得很慢,从延安到绥德,要走六天,到晋西北要走十天半月。要把党的出版物,运送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去,运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困难也就更大得多了。但我们做发行工作的,总是尽一切努力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尽快传播到全国人民中去。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毛主席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集会上所作的《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说,都是对准蒋介石、汪精卫这些投降派、反共顽固派的。当时,延安没有大礼堂,也无扩音器。会后,正当人们盼望毛主席的讲话全文早些发到自己手里的时候,我们中央发行部和新华书店的同志,就采取一切措施,尽力向延安、向陕甘宁边区、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发行了载有这些演说的书刊。

毛主席十分重视书刊运输问题,指示王林同志设计几个方案,先画好运输路线图,再到他那里去研究。方案一确定,我们先在晋西北兴县设立了第一个分店,由那里把出版物运往晋察冀、太行山、冀鲁豫、山东。还在西安设立了一个转运点,和新华日报西安营业所一起办公。只要有八路军的军用汽车去西安,总后勤部长叶季壮同志就会来电话通知,我们就把准备好了的书刊,装到车上,由西安转运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再转发给新四军各支队。这些经过八路军、新四军兵站转运的书刊,大家都当作重要的武器来保护它,运送它。从延安去敌后的干部也常常成为书店的义务运输员。他们把书看作比自己的财物还要贵重。在那种环境下,发行一本书的代价,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是难以计算的!

### (三)

一九四〇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延安以南的中部县(现为黄陵县),国民党设卡搜

查我军用卡车,从中发现有几箱《共产党人》和其它报刊,敌人就把它扣了。这件事对我们教训很深。从此以后,我们就把公开的或秘密的书刊和清样,分别情况,化整为零,藏在妥当的地方,尽一切可能,使之不暴露,以便运到西安转发到全国去。

我们还在陇东建立了一个分店。陇东是甘肃省的边沿,邻近那里国统区的陕甘军阀之间有矛盾,我们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把发给读者的零星报刊,在那里改装,通过商人或地下工作者,带到国民党统治区里,贴上邮票投邮,也收到了效果。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蒋军大兵压境,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在此困难时刻,毛主席指示我们要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采取新的斗争方法。我们将发往国统区的书刊打成清样,或运送纸型,到西安、重庆、桂林或香港,在那里翻印出版。为了应付国民党的查禁,有的书改换书名,事先印好几个不同的封面,遇到一种被查禁,而另一种内容相同但书名不同的书刊又发行了。

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发行书刊,困难更多。毛主席在听取了王林同志的汇报以后说:“这个问题我来说话,我来解决。”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就在《论政策》这个重要文件中指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从此以后,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地翻印延安的出版物,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里,相继成立了新华书店;在华中也成立了大众书店。《解放日报》还发表了文章,指出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 (四)

新华书店成立以后,还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为党中央各机关、学校图书馆,搜集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物,以供研究之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中央出版发行部曾

两次派我到重庆、桂林、贵阳等地搜集各种出版物。

敬爱的周总理当时正在重庆，也很关心这件工作，亲自要我去汇报工作，了解去桂林、贵阳搜集图书资料的情况，和延安的出版物在那里的翻印情况。当他得知我们在贵阳购到尚未由订户取去的二十部《鲁迅全集》要准备运回延安的时候，周总理为了照顾生活书店供应订户的实际需要，就指示我们退回十八部。他还嘱咐，带回延安的两部，要先送给毛主席一部。现在我们从照片上看到毛主席办公桌上放着的那部《鲁迅全集》，这就是遵照周总理指示送去的那一部。

当时的延安，很需要毛主席的标准像。因为延安印刷条件差，毛主席的像是用木刻印的，有些机关把像画在白布上，形象和规格都不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廖承志同志就在香港用最好的图片纸，印制了大幅毛主席像，上下两端镶有铜边，由我运回延安。运输途中，在四川广元，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一个国民党特务，借口搜查军用车有没有装非军用品，给我们刁难了两个多小时。特务说：“这木箱里的像不属于军用品。”我们说：“这是我们革命军事委员会毛主席的像，是运给八路军总部的。八路军的物品，都是军用品”。我们据理力争，说得这个特务哑口无言，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我们从大后方收集出版物，其中也包括国民党、托派、投降派的反动出版物。凡是反动出版物，我们都利用合法的邮政寄回延安；凡是进步的重要出版物，就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钱之光同志的关怀和帮助下，解决运输问题；要箱有箱，有车就运，用不着我们来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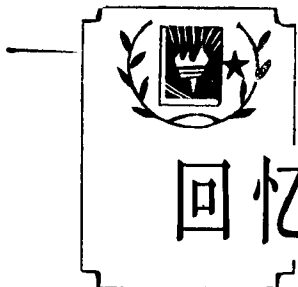
心。这些书籍一到延安，毛主席就派他的秘书柴沫同志来挑选。朱总司令骑着一匹大洋马，也常亲自来选购。

## (五)

当时在新华书店工作的同志，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在紧张、活泼、团结、友爱的集体生活中，工作战斗化、生活军事化。那时还有一首店歌，是由卜明同志作词、鲁迅艺术学院沙莱同志谱曲。歌词是：

太阳挂在宝塔山，  
延水弯弯在眼前。  
我们在这里工作，  
把革命的种子撒遍人间。  
我们象太阳那么欢欣、勇敢，  
象延水无止地流到辽远。  
太阳照遍了城镇、田野、高原，  
延水象粗壮的铁链，  
团结着亿万人民向前、向前。  
我们就在这里生长吧，  
等待这种子生长，  
到胜利的明天！

每天工作完毕，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打球。晚上睡觉之前，大家总要唱一首八路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唱着这些革命歌曲，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又传来了毛主席再次为新华书店题字的喜讯。一九四九年十月第一次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还亲笔题写了“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给我们指明了方向，鼓舞着我们前进。



宋玉麟

## 回忆延安新华书店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延安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灯塔。人们仰望着延安，纷纷奔赴这个革命圣地，为了追求真理，我于一九三八年到达延安，进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初到延安时，延安还没有书店，我们多么希望延安能早日有一个供应精神食粮的书店。不久，大家的希望实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新华书店在延安成立。记得开门的那天，我和几个同志欣然前往。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新华书店虽是新开，但门面也没有油漆，只有七间条件简陋的土平房，书架、书柜很粗糙，当然更谈不上玻璃橱窗和玻璃柜了，好在当时大家并不注重书店的外表装饰，只要求书店能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也就心满意足了。书架上摆的尽是一些没有切齐的毛边书。这里有在大城市的书店看不到的解放社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主席著作以及党的政策文件，还有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等。这些都是人们向往已久的传播革命真理的书籍，大家川流不息地涌向书店，踊跃选购图书。我在延安时，先后在“抗大”、中央党校学习，两校的地址同新华书店邻近，都在延安城北门外。所以，每逢节、假日，我们就常去书店看书，和书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新华书店成了我们心目中最受欢迎的地方。

一九四〇年十月，我在中央党校毕业后，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去关中分区工作。它在陕甘宁边区的南部，紧靠着国民党统治区西安，是边区的南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政委）是习仲勋、组织

部长是惠中权、宣传部长是高仰云、分区司令是文年生。一九四一年，我军在自卫反击的战斗中解放了关中重镇——马栏。随着，关中分区的党政军机关进驻马栏，这里也就成了关中分区政治、文化的中心，干部、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特别是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斗争的中共陕西省委，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迁来马栏后，在国统区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在“西北联大”的学生，一批又一批地涌进边区参加革命。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水平，中共关中地委决定在马栏设立关中新华书店。

那时，我在地委宣传部工作，年青活跃，同驻在马栏的党政军机关工作的同志较为熟悉，又刚从延安下来不久，对延安的情况也较为了解，地委组织部、宣传部就决定由我来筹建在马栏的关中新华书店。于是我开始参加了新华书店的工作。

一九四二年初，关中新华书店在马栏街的东头正式成立了。我是书店经理，又是营业员。说起来，马栏是个重镇，可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破坏，街上除了几家骡马大店外，就别无他店。书店成立时，看上去似乎不太象样，因陋就简，利用一个旧铺面作为书店门市部，把旧货架当作书架，准备陈放革命书籍，并把毛主席题写的新华书店四个字用土纸放大后贴在墙上。经过打扮的门市部，看上去也挺有精神。新华书店虽然成立了，但店里一本书也没有，只是一个空门市。为了尽快地满足大家对革命书刊的需要，我也

顾不上过年吃饺子，就在除夕那天，向地委借了一头骡子，领了四千元边币（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急急忙忙地赶赴延安。其实，我这个上海人还是头一遭赶骡子，平时见到牲口就害怕，更说不上还要自己赶，自己喂牲口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把书运回关中来。

当时，延安新华书店发行的图书也不多，绝大部分是解放社出版的，还有一部分是从苏联运来的。记得其中有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版），朱红色布封面，道林纸精装，十分讲究，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书。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封锁，国统区出版的进步书刊以及白报纸、油墨等出版物都运不进来。延安新华书店发行的书刊，大部分都是利用当地原料制成的马兰纸印的，品种、数量也不多。当然，能分配给关中地区的书，难以满足那里如饥似渴的读者需要。经过多次“诉苦”，总算例外地照顾，给了满满一驮子的书，装好后，就连夜运回关中。

回到马栏，书还没有来得及陈放整齐，就被大家争购一空，后来者只好望“店”兴叹！书是售缺了，但书店的任务没有完。当时新华书店的主要任务是：发行延安解放社的出版物；发行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负责分发部分党内文件、书刊。发行方式包括公开出售和内部分发两个方面。后来条件改善些，出版的品种、印数增多了，供需情况也就逐渐好转了。

我在马栏的关中新华书店工作不久，又被调往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的新华书店。那是一九四二年初，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一九四三年改为西北中央局）决定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担负全边区图书、报刊的发行任务，使当时中央出版局领导的新华书店摆脱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发行业务（撤消延安的门市），以便更好地开展全国范围（包括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书刊发行工作。

一九四二年三月，关中地委宣传部决定由关中报社张哲同志来接替我在关中新华书店的工作。我奉边区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的调令往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同我一起先后调回延安筹建书店的还有龚稼华（现任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马醒民两人。见面后才知道原来我们在“抗大”、中央党校都是同学。毕业后，龚稼华被分配在安塞县委宣传部，后开办安塞县新华书店。马醒民被分配在甘泉县委宣传部，后开办甘泉县新华书店。虽然我们三人都曾搞过书店工作，但为期不长，要搞好党的发行工作，还需要向中央出版局的新华书店同志学习。龚稼华学的是计划财务，马醒民学的是发行业务。为了筹建书店，记得我曾与龚稼华两人拿了边区中央局办公厅的介绍信，去边区银行找行长南汉宸同志，从他那里支取了由边区中央局常委决定的开办新华书店的经费边币拾万元。

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成立的，地址在延安南门外新市场。这是日寇轰炸延安城后新开辟的商业中心，是原延安南市区合作社的旧址，一座五间两层楼街面房屋，是书店向合作社折价买下来的。门口挂上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新华书店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显得光彩夺目。这座楼房比起原来在北门外的老门市宽敞明亮得多了，读者购书也方便了。书店门市既没有玻璃窗，也没有玻璃柜台，放上十来只粗糙的木书架，一条长木柜，虽然简陋，但也实用。底层做门市，楼上作办公和分发报纸用。

当时，新华书店主要是发行解放社出版的书刊，品种有：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列宁选集》多卷本等。二、毛主席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三、刊物。如《解放》、《中国妇女》、《中国文化》、《中国工人》、《中国青年》等。四、党内读物。如

《马恩列斯毛论共产党》、《党的建设》等等。此外还有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以及党内文件书刊等。

开办时，书店工作同志只有十个人。边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任命张良（宋玉麟）为经理。龚稼华负责会计兼总务，马醒民负责批发——对边区二十三个县的新华书店批发书报兼报刊订阅，并调入高淑惠负责党内发行，左海龙负责进货兼门市，张鼎负责分发报纸（通过边区通讯站），马照歧负责门市收银，运输、通讯、炊事等由三个青年人负责。十位同志都是革命发行战线上的新兵。当时书店工作人员的生活待遇同延安的机关、学校一样，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虽然物质生活比较艰苦，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十分愉快。书店的十个同志来自五湖四海，团结友爱，大家的工作热情很高，革命干劲十足。

为了适应党中央的研究需要，边区新华书店曾用“西北文化服务社”（这个名称较为灰色，是借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地搞的文化服务社）名义，向国统区——主要是重庆、桂林各书店联系进货，指名购进部分书刊，作为同业批发进货销售。用这种方法搜集了不少书刊，以供领导上了解和研究国统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动态。后来重庆地下党有位

同志来延安学习，当他知道我们用这个名义同国统区书店联系业务时，他兴奋地紧握着书店同志的手说：我们在重庆收到“西北文化服务社”的信后，曾分析研究过，认为可能就是延安新华书店的化名，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各种方式，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把需要的书刊运到延安来。

延安整风开始时，为配合整风学习，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出版过一本《整风文献》。书店当时没有编辑部、出版部，这本书的出版、印刷工作是请在八路军印刷厂工作的“抗大”职工大队的同学代办的。这本书封面是请解放日报社的张谔同志设计的。书分白报纸、马兰纸印的两种，前者（约一百本）供领导同志阅读，后者按定价在书店门市零售。

新华书店在延安诞生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它是在延安诞生的，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是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记得有一次，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曾在延安工作过的同志讲：“你们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呀！”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谆谆嘱咐，永远不要忘记延安的小米，永远不要忘记延安的革命精神，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1983、4、22

---

## 上海书业公所与上海书业公会

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上海成立了书业同业的团体组织，这是代表出版木刻、石印线装书的所谓旧派书业商人利益的团体，称崇德堂，由朱槐庐、黄熙庭等倡议仿苏州书业例集资建立的。至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始重组为书业公所。先后负责者有席子佩、陈泳和、叶九如、魏炳荣、乌仁甫、丁仁堂等。曾组织书业商团、书业正心团、书业同义会、崇德小学等，办理一些社会公益的同业福利事业。至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将财产文件移交给

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而结束。

一九〇六年，上海成立了代表铅印平装书为主的所谓新派书业商人利益的团体，拟订章程三十五条，并附出版公约十七条，经清政府商部立案。先后负责者有俞復、夏粹芳、狄葆贤、陆费逵、高翰卿、鲍咸昌等。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改称上海市商人协会书业分会。一九三〇年改称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

（梁 洋）



# 太行地区的报刊出版工作

史育才

## (一)

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出刊前,原冀豫晋省委即出版过省委机关刊物——《战斗》,双日刊,三十开油印本。这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最早的党办刊物。

冀豫晋省委改为晋冀豫区党委后,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出版了机关报《中国人报》,社址在山西屯留县寺底村,报社社长李竹如,编辑主任杜润生。创刊初期为油印,每期印行数百份。当年十一月一日改为铅印,当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终刊,共出刊95期。《中国人报》的出版和铅印厂的建立,为《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出刊奠定了基础。

为着更好地指导华北的对敌斗争,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华北刊行《新华日报》(华北版)。

一九三九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沁县后沟村正式创刊,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机关报。彭德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它的任务是:报导华北抗战——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斗争。委任何云为社长兼总编辑,陈克寒、李竹如为副社长,不久,李竹如即调山东工作。

《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的第三天,朱总司令便亲临报社视察,在全报社大会作了

重要讲话,他要求《新华日报》成为实现抗日方针的宣传鼓动力量。

一九四〇年,为加强《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作了“关于党报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必须加倍努力来帮助党报工作的发展”。通过决定的贯彻,报社在全区建立了广泛的通讯网,报刊的发行量激增。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间本地区的《黄河日报》、《胜利报》相继停刊,部分同志(刘祖春、安岗、郭渭等)调《新华日报》(华北版),进一步增强了报社的力量。

一九三九年,日寇打通了白晋路,把太行、太岳两个地区分割开来,《新华日报》(华北版)派魏奉璋等同志去太岳区,在太岳区党委领导下创办了《太岳日报》,后魏奉璋在反扫荡战争中牺牲,《新华日报》又派魏克明等同志去主持该报工作。

一九四三年中共太行分局成立后,《新华日报》(华北版)改由太行分局领导,改称为《新华日报》(太行版)。

一九四六年,晋冀鲁豫边区党委从《新华日报》(太行版)抽调了部分力量创建《人民日报》,留下的一部分仍为《新华日报》(太行版),它就是以后《山西日报》的班底。

## (二)

《新华日报》(华北版)从创刊起就以报馆的名义出版图书和期刊。如一九三九年二月毛主席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以后继续出版“前线丛书”,包括王稼祥同志著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左权、陆定一合著的《晋察冀边区怎样粉碎了敌人的围攻》等。延安出刊的《解放》、《共产党人》等期刊也及时翻印。

一九三九年底,阳城事变后,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与《新华日报》合并,张盘石、杜毓运、赵文敏、杨叙九、王友唐、黄君珏等一大批同志来报社,进一步加强了图书出版和管理

工作。一九四〇年设丛书编辑部，由张盘石同志领导，进一步加强图书出版工作。陆续出版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斯大林选集》、《思想方法论》、《新民主主义论》、《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等。

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北方局宣传部作出关于开办书店的决定，内称“在新华日报所在地开设新华书店总店，每个区党委所在地开设分店（太北区党委分店可由总店兼管，不再另设分店），领导和推动全区的书店工作。”一九四二年元旦，华北新华书店正式成立，地点设在辽县（现为左权县），经理为杜毓沅。在这一阶段，重点出版了整风文件，如《反对主观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共产党员修养》、《思想方法论》、《整顿三风文件廿二种》等书，为边区整风提供了充分的图书。此外，还出版了《论党内斗争》、《抗日时期的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等重要图书。一九四三年杜调离书店，由王显周同志继任经理。

一九四三年九月，华北新华书店与新华日报社正式分开，由涉县桃城村迁至黎城清泉村。组织上仍属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领导。当时的出版方针是：以出版大众通俗读物为主要任务，其次是一般读物。林火、王春同志先后任编辑主任。

为推动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一九四三年四月，边区文联和新华书店召开丛书编辑座谈会，确定出版通俗的大众读物和一般读物，并具体确定了编辑组的负责人：张秀中负责文艺组，靳典谟负责戏剧组，蔡九昌负责美术组，王显周负责自然科学组，张鱼负责根据地组。之后据以出版了一批“大众文艺小丛书”。

在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小二黑结婚》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出版，彭德怀同志为之作了“象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的题

词。十二月又出版了《李有才板话》，这两本书都是多次再版。之后，又陆续出版了《孟祥英翻身》、《李家庄变迁》、《福贵》、《地板》等读物。还出版了《石圪节煤窑起义》、《李勇大摆地雷阵》、《重庆的喜剧》以及陕甘宁边区的《女状元》、《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还重印了《甲申三百年祭》、《前线》等大后方出版的书籍。被称为新华书店自执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来，业务大为发达的时代（见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新华日报》）。

一九四五年出版了《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重要著作。这年出版图书124种，59万余册。其中党的领导同志的著作及马列著作作为12万册，通俗读物36种、29万册。

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华北新华书店由章容主编出版了综合性通俗刊物《新大众》，一九四七年停刊。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出刊《新大众报》，初为周刊、五日刊，又改为三日刊，发表过一些思想评论，密切配合了土地改革运动。此外，华北新华书店还出刊过《华北文化》、《青年与儿童》等刊物。

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六年，华北新华书店由山区迁往邯郸，成立永兴印刷公司，承担《人民日报》与新华书店的印刷任务，王显周同志任该公司经理，并兼任新华书店经理，史育才任书店副经理。是年秋，由于平汉战役，公司与书店又迁回武安。

一九四七年五月，由王中青同志主编的《晋察冀边区文化创作小丛书》，共25册，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北平解放前夕，出版了《毛泽东选集》。

一九四八年四月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区，两大区的书店也合并，仍称为华北新华书店，由华北局领导，正副经理为史育才、李长彬、王钊，下设冀中与邯郸两个总分店。

一九四九年四月，华北新华书店迁到北京。是年九月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

会议，作出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议，成立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华北新华书店即由总管理处领导。

华北新华书店迁京后，编辑部的大部分同志参加了筹办《工人日报》的工作，王春任《工人日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本地区除华北新华书店以外，还有华北书店、边区政府教育厅的裕民印刷厂和129师的印刷厂，他们也都出版了不少的图书和课本，分述如下：

华北书店是在一九四〇年冬，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从延安派李文、王华、刘大明等同志到华北来筹办的，在北方局宣传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开始店址设在辽县桐峪镇。他们的事业心很强，经验丰富，作风朴实，刚铺开摊子，他们就用油印的办法，印行了《阿Q正传》等鲁迅著作和《烟袋》、《不走正路的安德伦》等一些翻译的文艺小册子，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以后以翻印生活、新知、读书三家书店以及大后方进步书店出版的图书为主。由于业务的开展，从新华书店调赵国良等同志去该店工作。一九四三年改名为“韬奋书店”。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集中使用干部的要求，于一九四四年该店又与华北新华书店合并。

裕民印刷厂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所属的单位，主要是印行中小学教材，供应本区学校使用。一九四七年该厂与华北新华书店合并，课本的出版发行任务，也由新华书店担任起来。129师印刷厂所出版的书刊专供部队需要，一般不向社会发行。

### (三)

《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一份铅印的日报，它的印刷厂是在《中国人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厂长周永生是从延安派来的，部分工人是党组织从西安动员来的（如：王尚祥、刘骥、张九岭、王剑萍、阎培召等），有一部分是太原的老工人（如：张建功、周子高、魏玉

金、鹿松林、张尔通、王政和、刘德润等）。一开始只有三台四开机、一台三开机，一台铸字机、还有几部石印机，这就是印刷厂的全部设备。只有铅字没有铜模，缺字全靠老工人宋亮珍刻制，直到一九四〇年才从西安买回一副新五号铜模来。没有打纸型机、浇铅版机，只靠活字版印刷；铅字用后重新上字架，多次使用。到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字的棱角、线条磨光，字迹模糊，成为读者对《新华日报》的主要意见。为解决这个问题，王显周、周永生、张建功偕同工人创制了打版机、浇版机，用雁皮纸和云母粉作材料，打出了第一副纸型。朱总司令为此事，在五月二十三日向报社写了贺信并发了奖金。以后，云母粉和雁皮纸也难以购进，就到山上去找来云母石，并利用薄毛边纸代替雁皮纸，就完全解决了这一问题。浇铸铅字、铅版用的铅，敌占区是禁运的，我们就到农村去几斤几两的收购；纯铅是难找到的，就在收购来的锡器内，掺上一定比量的铋，代替铅来应用。工人对铅非常珍惜，排字、浇版车间扫起的垃圾都要筛过，把碎铅捡出来后才把垃圾倒掉。印刷机没有机械动力设备，一直用人工摇把。机器坏了完全靠小炉匠师傅韩晋升，用一双巧手和砧锤家具修理。油墨是用蓖麻油和松烟自己研制的，技术人员是王嗣英。每天要出一、二万份报，还要出版些书刊，纸张是个很大的问题，抗日根据地里所能搜罗到的各种纸都收集起来了，可是在一九四〇年就用光了，甚至把红红绿绿的有光纸都印成了书（如《斯大林选集》、《左派幼稚病》等）。于是决心自己办纸厂。根据地产大量的麻，过去有作糊窗纸的小纸厂，就在这种基础上，把捞纸的帘子加以改造，以漳河水为动力，办起了纸厂，之后又接连办起了两个，并与几个民间纸厂订了合同，之后根据地的书报，都是用这些又白又结实的麻纸印制的。提起这些事，就会想起当时的报社和书店经理王显周同志，他具有科学知识和实干精神，上述这些困难大都是他



带领大家克服的。当时根据地没有照相设备，为了形象地表现事物、美化版面，就充分发挥木刻的作用，它所用的工具、材料，就是几把雕刻刀和梨木版，既易找又轻便，陈铁耕、罗工柳、华山、彦涵、杨济等同志的艺术天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把这些作品展览一下，将会展现“一代风流”。办报首先要有电台，由于敌人封锁很紧，电池有时都接济不上，找了个旧马达用手摇着作为代用品，由于用起来易出问题，有时也会出些错误，譬如，一九四二年在接收延安拍发的一篇文章，将其中“哗众取宠”一词，误收为“雾中取宝”，之后，报纸上还发表一篇《雾中焉能取宝》的文章。这些记忆，只是说明敌人的严密封锁，给我们带来的困难。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我们的采购人员一直对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敌占区购进一些必需的物资，张向林、黎旭、赵永恩等同志，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总之，在报纸、书刊的出版印刷中困难是很多的，但是在党的领导和鼓舞下，群策群力，发挥自力更生的精神，困难被一个一个迎刃而解了。

#### (四)

下面谈谈报刊、图书的发行工作。

报纸的发行主要依靠各地县党委。当时，太行地区六个地委所在地各设了一个新华日报办事处，县设分销处，报纸就按乡镇系统分发下去。报社设发行科、交通科，每天将报纸分送八路军总部（包括北方局）和六个办事处，报纸均由交通员挑担分送，沿途设站，不分昼夜接力转送，最远处二天多送到。崎岖的山路，湍急的河流，多少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多少次顽军（朱怀冰等）的刁难袭击，都阻挡不住交通员同志们完成任务的决心，使党的声音及时地传遍太行山区。图书的发行也依靠这些办事处和分销处。

一九四一年，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设交通局，经北方局宣传部同意将发行工作交交通局承担，实行邮发合一。报社的部

分发行交通人员也调给了交通局。之后，报社只在麻田、索堡、西达城等地设新华书店门市部发行部分书刊。

一九四二年北方局宣传部发出了“关于晋冀豫区出版发行工作的决定”，在太行区建立了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各区党委所在地也先后建立了本区的新华书店。书籍出版部门和报社有了个明确的分工。

一九四五年一月，华北新华书店在榆社县搞了个由群众集资创办文化合作社的试点，既发行图书，也经营文具。这是书店利用社会力量发行图书的最初尝试。之后，有的县和中学也办了文化合作社。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太行行署向太行区各专、县发出通知，内称：“为了各县便于解决小学课本发行的许多问题，我们在专署教育科长会议上提出号召各县普遍组织文化合作社，其经费除教职员、学生集股外，在经济条件允许下，可把县教育粮款借出一部分（规定日期归还）作为流动资金。成立后可直接与新华书店联系，代销书籍（行署已和新华书店订合同）。”根据行署指示，太行区各县普遍建立了文化合作社。这种形式在太岳、冀南等区也有采用的。从此太行地区形成了以新华书店直属店为骨干与文化合作社相结合的图书发行体系。

一九四八年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区书店合并后，是年十一月华北局宣传部《关于书刊出版审查制度的通知》重申：“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新华书店统归各该区党委领导，与华北新华书店建立业务关系。”该文件还规定：“冀中、北岳、晋中三区及石家庄市的出版任务，则由华北新华书店及冀中、邯郸总分店解决之。”

抗战期间，向敌占区发行图书也是新华书店的一项重要业务。我们曾将《新民主主义论》、《论新阶段》等书，伪装成《文史通义》、《虞初新志》，向敌占区发行，封面装帧、扉页的题词，古色古香，唯妙唯肖，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因此得以通过敌人的文化封锁，宣传